

■ 纪 念

新时期文坛的一张硬弓

——张一弓和他的创作 □何 弘

2016年1月9日下午3点多,张一弓老师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一弓老师于14时59分逝世。尽管此前我就知道一弓老师的身体多个器官已经严重衰竭,目前的医疗手段已无回天之力,但得到消息,心情仍然非常沉重。第一时间,我将张一弓先生逝世的消息以不同形式发布了出去,并迅速得到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与反应,说明大家对张一弓还是有着相当高的认可度的。

张一弓的写作生涯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的。他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自幼就喜爱写作。父亲张长弓生前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生前是开封女子高中语文教师。他在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熏陶,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1950年,他写的一首叙事诗获开封高中写作比赛第一名,并因此被校长杜孟模先生(后任河南省副省长)推荐到《河南大众报》工作,成为一名“记者娃”。后来,随报社合并进入河南日报社,从1950年到1980年,从事新闻写作30年,从见习记者一步步成长为副总编辑。

张一弓1956年开始发表小说,第一本书是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金宝和银宝》,并在《长江文艺》《牡丹》上发表了《我的老伴》《打播》等小说。1959年,他发表在《牡丹》上的短篇小说《母亲》,被认为是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给右派母亲唱赞歌”的“大毒草”,受到批判,自此中断小说写作20年。

张一弓的文学创作主要在新时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以关注社会现实变革为主的中短篇小说创作期;第二个时期是以关注人性和民族性格为主的探索期;第三个时期是以关注个人经历和历史为主的长篇创作期。张一弓是一位具有强烈现实意识的作家,他称自己是“同时代人的秘书”。他认为作家的创作虽然要表现“自我”,然而“自我”也有“小我”和“大我”之分,“大我”才能引起大家共鸣,否则读者没有理由看你的作品。缘于这样的创作理念,他的创作努力追踪农村的变革步伐,以充满热情和理想的现实主义特色为人所称道。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他的创作转向对人性、人的生存境遇、人的失落与寻找等问题的揭示。他善于塑造带有英雄气质和传奇色彩的人物,具有欧化色彩的语言与强烈的乡土气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饱满的文学激情、悲壮激昂的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对于张一弓创作的特点,在他去世后,我曾拟有一联来概括:“社会意义人性意识文学蕴熔铸铜钟警世界,乡村情感英雄情结浪漫情怀充盈驿站栖精魂。”我以为大体能体现出张一弓老师的创作追求和基本特征。

新时期文学发端之初,张一弓以其对现实变革的敏锐嗅觉和大胆精神,取得了令中国文坛广泛瞩目的成就。应该说,他这一时期能取得如此成就,与他长期从事新闻工作培养起来的对现实和政治的敏锐感觉有着密切的关系。当然,这也需要巨大的勇气。1979年,张一弓暗自创作了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收获》编辑

2016年1月14日,雾霾再次袭击京城。这一天,得知作家王士美在长春因病逝世。和朋友联系,交谈总是哽咽。17日,地面白了,我的心也空落落地白。

1980年初,父亲还在舒兰县新安公社围山大队当老师,我们家里有很多旧书,这些旧书是父亲下放之后带到农村的。父亲有一次外出,买回来一本顾笑言、王士美、汪东林编著的《李宗仁归来》,给我印象颇深。

1985年,我参加了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作家》杂志社文学创作函授中心的学习。1986年再次参加学习,并被函授中心选到北戴河参加改稿会。

第一次见到王士美老师时,他47岁,国字脸,北方大汉形象,说西北话,对人和蔼可亲。他热情地迎接每一位学员,提醒我们多读书、多观察生活、多练笔。他关心人的样子,不像严厉的老师,更像是慈祥的父亲。

往日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在北戴河临别之际,我和王士美老师说,将来能坚持写作的不会有几个人。王老师深沉地看着我,目光当中带着坚毅,他似乎在说:看你小子能

快20年了,那场地震仍历历在目。这是我一生中永远忘不掉的一场灾难。地震发生后,我们所有在度寒假的老师从四面八方火速赶回玉龙雪山背后那所破旧的山村中学。回到学校,看到倒塌的校舍,我们的心一下沉重了起来。

丽江县第六中学坐落在玉龙雪山背后70多公里的山坳里。虽说是开春了,但玉龙雪山背后的鸣音水沟里还结着厚厚的冰,早晚寒风刺骨,洗脸水倒出去马上就结成了冰,我们在学校操场上搭防震棚。说是操场,其实就是一块山坡上开挖出来的沙土空地。

很快,我们一家三口分到了一间不到15平方米的油毛毡宿舍,一间5平方米左右的厨房。木板搭的油毛毡房漏风,晚上寒风呼呼地从门缝里灌进来,我就把报纸揉成团去塞。那时,儿子才1岁多一点。宿舍与宿舍之间的隔板根本没有什么隔音效果,晚上小孩解手哭闹,左邻右舍的老师都听得见。

为了保证如期开学,我们提前回校的老师们挽起袖子加入了搭建教室、厨房的队伍……不久,学校如期开学了。钟声敲响,沙土地上的防震棚里传出了琅琅的读书声。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防震棚中间冉冉升起,迎风飘扬。那段时间,同学们学习更加刻苦努力,老师们上课更加认真负责,几乎没有迟到和纪律松懈的现象。

一天,我们正在砌墙,学校里来了

部在大量群众来稿中发现了这部作品,并发表在1980年《收获》第一期,在读者和文学界引起轰动,评论界把它视为“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之一,称李铜钟是“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作者也由此恢复了中断20年之久的文学写作。今天看来,《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这样的作品无论从哪个层面讲,并没有特别出格的地方。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创作这样的作品所遇到的阻力和压力是非常巨大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时曾两次受阻,张一弓的上级部门领导,虽认为作者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却执意不同意发表这部作品,稿子校样曾被迫从版面上拿了下来。担任《收获》主编的巴金老人毅然拍板,推出了这篇作品。后来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参评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时,再次受到来自作者上级领导部门的严重阻挠。阎纲曾在《悼犯人李铜钟》中谈到当时评奖的情况:“评选委员会不得不向评委会主任巴金实情禀报并请示。巴老不但同意该作得奖,而且力主列为一等奖中打头的一个。”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则向笔者讲述过这次评奖更复杂的经过。其时,为调查落实张一弓和《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有关情况,高洪波被派到河南进行调查。高洪波到河南走访了有关单位,和文联等部门的领导交换了意见,最后认为这部作品获奖没有问题。这时,高洪波才去见张一弓。高洪波说,见到张一弓后,他弯腰从床下拿出了一个瓶子。高洪波以为张一弓因为高兴要拿出酒来庆祝。但张一弓说,这是一瓶“敌敌畏”,我随时准备将它喝下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张一弓当时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他准备为此牺牲的勇气。

1980年4月,《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发表不久,张一弓被调离新闻工作岗位,下放到登封农村,先后在卢店公社和县文化馆担任副职。当时的中国农村正发生着以“包产到户”为重要标志的历史性变革。张一弓亲身参与了这场变革,这使他有可能会延续长期以来作为一位记者对我国农民命运的关注和思考,紧跟时代步伐,并写出了30多篇、100多万字的表现这场历史性变革的作品。继《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一等奖之后,《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姐儿和她的小嘎斯》获全国第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该奖项在第一届评奖以后不再分等级);《黑灶照相》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有8部小说被搬上影视屏幕。

1983年秋天,张一弓作为获得三次全国性文学奖的作家,从登封调入河南省文联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并先后担任了中国作协理事,省作协副主席、主席。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创作上已经不能满足于对现实生活进行表层的“直来直去”的反映,希望在弥漫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古老文化的神秘感中,着力于民族的生命力量与民族性格的发现。调整了焦距,拉远了视角,写了一些具有浓烈的象征气韵,把讽喻、神

怀念王士美老师

□马志刚

坚持多久?

当时,吉林省作家进修学院(现吉林文学院)是我们心中向往的读书之地。第一届招生时,我阴差阳错没有参加入学考试。1989年,我实现了去学院学习的愿望。

开学当天,王士美院长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们来自全省各地的40多位学员,还有5名外省学员,住在长春空军预科招待所。从1986年到1989年,整整3年,一次次得到了王士美老师各方面的关爱。

为学员讲课的老师,除了本省作家公木、鄂华、胡昭、乔迈、丁耶、芦萍、马犁、王成刚、王汪等,还有吉大的老师邵正、孟宪忠、杨冬、刘学铭、孙乃冀,东北师的周玉和、李南岗等。

■ 讲 述

艰辛岁月中的文学记忆

□刘志文



家里,叮嘱我尽快回学校好好教书,“山村的娃娃可怜,你要好好教,一定要教出一批大学生”。

那一年,老家房子的围墙震开了好几条可以放进个拳头的裂缝。我这个在外教书的老师也被算作是受灾户(当时分家时老父亲在老家给我分了一套楼房),为此我也得到了党和政府的关怀。按照受灾破损程度,老家七河乡政府给我补发了800元的补助。当时,我深受感动。

毕业之后,我去《长春法制报》工作了。不久,该报停刊。在我人生徘徊的时候,王士美院长安排我到文学院工作,还特意安排了住处。他担心我一个人不会照料自己,还提醒其他人关照我。

以后的几年,我在许多地方工作过,直到1995年我到了北京。但不管到了哪里,都和王士美院长保持联系。

1997年1月11日,王士美的新作《切·格瓦拉》出版,并在古巴大使馆举行签名赠书活动,他叮嘱我一定要参加。那次活动搞得很热烈,反响很大,不久后古巴政府邀请他去古巴考察,我为此高兴不已。

在以后的日子里,王士美院长偶尔路过北京,我们在京的同学都要和他团聚。2013年,我到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的下属企业工作,这个地方距离王士美老师曾经生活的地方通辽230公里。我给他打电话,希望他能故地重游。但直到他去世,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我知道他魂牵梦绕着的那片科尔沁草原在呼唤着……

他走了,到了另外的世界会不会很孤独?

1

2015年年初,女儿呱呱坠地,时间仿佛慢下了脚步,我有时间发呆和凝望。一天,趁女儿熟睡,我与母亲闲聊,惊讶地得知她生下我之后又怀孕过两次,可惜都打掉了。“竟然还怀过两次?我一直以为你生下我之后只怀过一次!”我大叫起来。印象中母亲只问过我一次“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母亲解释说,当时国家推行独生子女政策,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很好,能够专心把我养大已经不容易,更不要说养两个或者三个孩子。对于初为人母的我来说,打胎是多么不可思议和不可接受的事情。我当即追问:“为什么后来没有再问我了,也没有告诉过我后面一次打胎?”母亲说:“你没有问过啊。”

做了十多年记者,做了两部有关深圳的口述历史,我曾花费成百上千个小时听逾百深圳人讲述自己与这座城市的故事,可是我却没有认真坐下来,打开录音笔,问一问我的父母、丈夫,甚至自己,一些从来没有问过的问题,聊一聊那些曾经擦肩而过的生命,用文字记录一些如果不再温习即将消失的记忆,重新打量我的家,这座城。

2

2006年5月,因为结婚,我和先生回到了家乡南昌。筹备婚礼之余,我们去了我的母校南昌二中,还有我家在孺子路上的老房子。上世纪90年代,美丽的百花洲畔,每年高考放榜时,二中校园里蔚为壮观的红色榜单,前面十几张总是挤满了清华、北大、复旦、上海交大等声名赫赫的学府,无声地诉说着这所省重点高中的骄傲。同时,我也深深记得放榜那天自己那颗卑微的心——从最后十来张写满“南昌大学”的榜单上寻找“熊君慧”三个字。

从学校步行十来分钟,来到孺子路上的家。弄堂似乎更加低矮、幽暗,楼梯间摸黑没上几步台阶,就到了二楼。打开家中大门,左手第一间房曾经是我的闺房,此时只剩下木床和书桌。床上的刻字还清晰可见,那是一个少女对母亲严苛管教的一缕怨念啊!窗户与隔壁楼房二楼阳台,只有纵身一跃的距离。下面是一楼违规搭建的院子,邻居说话的声音还是那么清晰。就是在这么“亲密”的邻里环境中,一个花季女孩在临窗的书桌上,写下了密密麻麻的日记和书信,填满了整个青春期。

才离开4年,这个家已经简陋得不值一看。那个下午的阳光一下在我内心的惊慌和内疚中走失:我在这个房子里的21年时光,已经被深圳热腾腾的生活消融殆尽了吗?这是曾经给了我无数安宁的长夜与成串的好梦的家啊!曾经以为怎么也过不完的日日夜夜,倏忽之间就流走了。后来,我在房子里拍了几张照片,带回了深圳。

还好,我还有母亲在身边。不过,她已经不是那个严苛的中年女人,而是整天围着灶台转的老太太。为了变着花样给女儿做吃食,每天下午4点半,她拿起笔和纸,看着电视的美食节目做笔记。

3

2011年春天,梅州大埔,三河坝大桥上。西岸,一个头扎发髻、背男牵女的客家妇女巍然屹立。我想看一看客家母亲的脸。可惜,近10米高的石雕,年轻母亲的眉眼不甚清晰。过江至东岸,站在笔枝山头,同行者在眺望韩江,我则远眺母亲雕像。她体态丰腴健硕,头偏向一侧注视着怀中的幼子,表情仍然是模糊的。天下的母亲,似乎都是如此。天色渐晚,母亲的面容,注定在月色下老去。

那一刻,我想起了在深圳的母亲,我没有让她成为留守老人——2004年,父母从南昌来到深圳,跟我一起生活。在这个迁徙已经成为常态的年代,家在哪座城市并不重要,能够看着父母的面容慢慢老去就是儿女的幸福。

这几年间,身边的亲人、朋友、同事……有这么多人和我一样,陆续步入结婚生子的年纪,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结婚、生子都在这座城市完成了。

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对于这座城市的记忆就像一间堆得满满的阁楼可以翻拣折腾。可是,住多久才能把一座城认作是家呢?一个人心中的家乡,并不仅仅是有自己的房子、工作和朋友,而是这里有你经年累月度过的日子,你的脚步甚至呼吸心跳都和这里一个节奏了。

有一天,母亲来看外孙女。女儿刚刚学会爬,咿咿呀呀爬得欢。母亲忽然说要把南昌的两块墓地卖掉。“我和你爸百年之后骨灰撒入大海就好了。深圳的海多好啊!”我们也许无法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却可以选择自己最终的归宿。母亲都愿意托付百年身的地方,我怕是一辈子都离不开了吧。



不上几瓶饮料的年代,那几瓶饮料对于我们这些穷山沟里的老师来说,也算是奢侈品了。

那段时间,我在学校创办了“小溪流”文学社,还出版了四开八版的《小溪流》文学小报。那时小报在地区印刷厂正规铅印,印数最多的一期高达5000份。小报在全区校园内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受到了许多师生的一致好评。当时分管教育的行署副专员杨文彬还专门托县教委主任和承勇给小报捐款50元。作家汤杰杰、省委宣传部范子模到宝山石头城采风路过学校,还专门给小报题词鼓励。更难得的是,《青年作家》专门给文学社捐赠了一批图书和写稿投稿用的稿笺(当时写稿投稿都用方格稿笺,乡村里买不到这种方格稿笺),还专门从《小溪流》文学报上选发了7首学生的习作。这对我和学生们的鼓励及影响,用“巨大的”“深远的”这些词一点都不过分。后来从《小溪流》走出了一批年轻的作者,现任《丽江读本》主编的王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在学校里,我有幸碰到来下乡的县委宣传部张赛东老师,他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没什么困难,就是买不到投稿用的方格稿笺。不久我就收到了一摞印有县委宣传部字样的稿纸。我深深地被这些鼓励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前辈感动。他后来调任《丽江日报》总编辑,又成了我的领导。于是我更加努力创作,作品一篇篇在省内外报刊发表。

如今,每当在工作生活创作中碰到什么挫折时,我总会回想起那段艰辛的岁月,一切就会释然。我反问自己:“与过去那段艰辛的岁月比,这点困难与挫折,这点伤这点痛这点苦,算得了什么?”

那一年,算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之一,但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年。我从一名山村教师成长为一名记者,开启了人生的新篇章。我感谢那段艰辛的岁月。

20年过去,不单是丽江城里大变革,当年的重灾区金山、白沙、黄山等也大变革了,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文化旅游城市在废墟中崛起。不但丽江变革了,我的老家七河也大变样了,村村通油路,家家门前水泥路,村前大棚蔬菜,村后干沟清水流,村中有球场。空中飞机飞,地上汽车跑,夜晚还能听到火车的汽笛声。数字电视、电话进家里,人人用手机。前不久去宁蒗,路过学校,学校也是焕然一新,原来油毛毡房的操场如今变成了美丽的校园一角。

在防震棚里吃奶的儿子如今已成了大学生;妻子继续在校园里辛勤耕耘,早已桃李满天下。我离开校园在报社努力工作,如今也实现了当初在油毛毡房里挑灯夜战时的目标,出版了自己的个人文集。

在回忆“2·3”大地震、纪念“2·3”大地震、感恩“2·3”大地震中的人和事的同时,我们又该做些什么?惟有珍惜!

跟一个地方的时光混熟了

□熊君慧